

哲學與文化

與

吳經熊◎著

 三民書局

哲學

與

文化

吳經熊◎著

 三民書局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哲學與文化 / 吳經熊著. — 二版. — 一刷. — 臺北市: 三民, 2006

面: 公分

ISBN 957-14-4432-4 (平裝)

1. 哲學—中國—論文,講詞等
2. 文化—比較研究—論文,講詞等
3. 孫文主義—論文,講詞等

120.7

95002516

◎ 哲學與文化

著作人 吳經熊
發行人 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/ (02)25006600
郵撥 / 0009998-5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初版一刷 1971年4月
初版四刷 1985年11月
二版一刷 2006年3月
編號 S 100080
基本定價 參元陸角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4432-4 (平裝)

再版說明

二十世紀享譽國際的法學家——吳經熊先生（1899-1986），以 23 歲青年之姿，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後，便開啟了豐富多彩的法學生涯。在法國、德國和美國深造期間，與霍姆斯大法官、施塔姆勒、歐根和龐德等著名法學家書信往返，激盪出一篇篇創造性與深度兼具的文章，引起歐美法學界的熱烈回應。

25 歲回國後，擔任東吳大學教授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顧問，28 歲受命為上海特區法院法官，其後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、南京政府立法委員、司法行政部部長，於 30 歲，被任命為上海特區法院院長。同年，在美國哈佛大學與西北大學的禮聘下，成為我國任教於哈佛大學的首位教授，西北大學羅森泰講座的第一位講座教授。1933 年，34 歲的吳經熊先生參與「中華民國憲法」起草工作，將其思想精華融入憲政體制，落實法理於現代社會，以建設正義民主之理想國度。

38 歲皈依天主教後，在編寫法律論文和專書之餘，吳經熊先生以溫暖感性的宗教情懷表達他對世界的關心，陸續出版了《聖詠譯義》、英譯《道德經》、《內心悅樂之泉源》、《唐詩四季》等書，

本書《哲學與文化》亦是這時期的作品。

本書收錄 10 篇介紹中國哲學、中西文化差異以及國父思想的文章與演講稿，在引經據典的論說中，仍見溫柔筆觸，在演講中，猶聞吳經熊先生鼓勵後學的熱切心跳，體貼之情，溢乎文脈！

三民書局編輯部 謹誌

哲學與文化

目次

再版說明	
儒家的悅樂精神	1
莊子的智慧	11
中西文化的比較	47
中西文化的討論	79
正義的探討	93
國父思想之綜合觀	99
國父的學問與人格	145
總統的文化觀	161
總統的人生哲學	171
總統哲學思想的蠡測	185

儒家的悅樂精神

一、孔子與顏子

儒家的人生哲學，不外乎做人的道理。可是這個哲學最顯著的特色就在它是注重腳踏實地，逐步漸進的。比如孔子說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（〈雍也〉）這個「之」字，就是代表做人的道理。第一步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道理，至少這個道理的主要原則。第二步是要我們對於這個道理發生興趣，漸漸地進入欲罷不能的地步。第三步才達到與道契合，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的境界。第一步是「知之」的功夫，第二步是「好之」的功夫，第三步才到「樂之」的最高峰。

孔子有次說：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實者有矣夫！」（〈子罕〉）在孔子的構想中，一個人格的完成，必須由發苗而吐華，由吐華而結實。這也同「知之」、「好之」、「樂之」的三部曲，一氣貫通的。

《論語》這部書之所以令人百讀不厭的緣故，就在它洋溢著

悅樂精神。《論語》開頭就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（悅）乎！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」這寥寥數語，已經把孔子的人生觀和盤托出了。孔子不是生而知之者，可是他的好學卻是天生的。我以為好學是世間最可寶貴的天才。孔子對於這一點，也曾坦白的承認說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（《公冶長》）他也曾很有風趣地描寫自己說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（《述而》）做學問達到這個地步，才是別有一番滋味。

孔子對於任何學問，只要是值得研究的東西，都是用全副精神去學，直到醉心忘食，樂以忘憂的地步。譬如音樂吧：「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」曰：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」（《述而》）還有對於《詩》，對於《禮》，對於《易經》與《尚書》，孔子也都有蓬蓬勃勃的興趣，和敏銳深刻的欣賞。

孔子的內心生活，非常豐富，而且有活潑潑的氣象。所以雖然他的一生，處逆境的時候佔了十之八九，總不見寂寞無聊，牢騷滿腹的情緒。莊子曾說：「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通亦樂，所樂非窮通也。道德於此，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。」（《莊子·讓王第二十八》）這段話實在可以為孔子寫照。孔子所貴的是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（《述而》）正唯他著重內心生活，所以他的快樂，能不受環境的影響；即在陳蔡之厄，據說還是從容容地絃歌自若。孔子自己也曾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《述而》）這豈不是內重而外輕嗎？孔子稱讚顏回說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（《雍也》）在

孔子的學生當中，只有顏回，稱為「好學」；我們由此可以推斷顏回也已達到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」的境界了。

以上所說，都是為了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」這句話下一個註腳。我們現在可以進而研討第二句話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」

我們要知道，孔子不是一個性情孤僻的人。他是愛群的，富於友愛精神的。他說過的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；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」（〈微子〉）人群之中，他尤其喜歡與志同道合的人們在一起。在他學生當中，雖然只有一個顏回與他心心相印，可算是他的知音，可是也有不少對於做人的大學問具有真切的興趣的。他對於他的學生，是十分謙和，十分民主，把他們皆作朋友看待的。他同他們討論學術的時候，是採取一種切磋琢磨的方式的。所以他實在是一個理想的教育家。他在教導人家的程序中，自己也往往能得新的知識，新的見地。他不是說過的嗎：「三人行必有吾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（〈述而〉）所以他愛朋友，一半是為樂群，一半也是為學問上的進益。不過，為什麼要說：「有朋自遠方來」呢？難道自近方來的朋友就不能使他快樂嗎？難道只有遠來的和尚會念佛嗎？關於這一點，朱子的註解說，有朋自遠方來，尚且可樂，若有朋自近方來，更不必說了。伊川先生則說：「以善及人，而信從者眾，故可樂。」依筆者看來，這兩個說法，都多少有點道理。但是主要的理由，恐怕還是另有所在。第一點，我們要知道，孔子是富於人情味的。從遠方來的朋友，一定是好久沒有見了，所以看見了就特別高興。這也是人情之常，與「他鄉遇故知」差不多一樣的可喜。第二點，遠方來的朋友，

對於遠方的風俗人情一定是很熟悉的；他們的報導也一定可以增益我們的知識。孔子曾說：「益者三友，……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」（〈季氏〉）遠方來的朋友，至少是多聞的。這大概也是孔子特別歡迎他們的一個理由。陳立夫先生，在他的《四書道貫》裏，對於這句話的按語是：「朋友來自遠方，常可帶來不少新知，可以增益智識，或輔助德行，是為人生一大樂事。」這實在是深獲我心了。

一個人如果能好學不厭，復有朋友切磋琢磨，他的內心生活，應該是很快樂的了。但如果沒有「人不知而不慍」的功夫，那悅樂精神就不會很穩固的。可是，「人不知而不慍」這句話，是談何容易啊！一個人的學問越高深，懷抱越偉大，一般人對他越難了解，甚至越會發生誤會。除非有悠久深厚的涵養，內心的苦悶，是不能避免的。即如孔子也偶有「莫我知也夫」的感歎。但是當子貢問他「何為其莫知子也」的時候，他回答說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。」可見，孔子雖然不被世人所知，他卻沒有陷於苦悶的心境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孔子具有極濃厚的天道意識。即使世人不知道他，他在心靈深處仍然是有安慰的，因為他相信天是無所不知的，所以也洞悉他的心思。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（〈顏淵〉）這就是孔子內心悅樂的最後保障。

二、孟子與王陽明先生

孟子對於悅樂哲學最大的貢獻，就在他的人性本善之說。因

為人性是天生善的，所以人的可貴在內而不在外。人性是天所賦予的，裏面就有仁義理智的根苗。我們只要將這個根苗好好的培植，使它發達到極點，我們的人格就完成了，這樣我們就有了至可寶貴的天爵。他說：「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」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只有天爵是可貴的，因為它是永久的，不是人家所能奪去的。至於人爵，那是無足輕重的，因為「人之所貴者，非良貴也。趙孟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。」（《告子上》）總之，天爵包括天下一切值得追求的東西，而人性卻包含天爵的根苗。所以他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；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！」（《盡心上》）「反身而誠」大概是說，如果在反身自問的時候，發覺我們真的是仁義忠信，而且樂善不倦，那我們內心便充滿了悅樂。《中庸》裏所說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就是將性內所具的善根充量發達了，那就稱為「道」。性是道的起點，而道是性的終點。性與道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對有道者來說，道就是他的性。所以孟子說：「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，晬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」（《盡心上》）這就是「率性」的工夫成熟時，性內的善根——即王陽明先生所謂「天植靈根」——已經成為一棵大樹，這棵樹的根是在心靈之中，可是它的枝葉花果卻充佈了整個兒的形體。這樣才能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因為存心養性的功夫一經純熟，內心與形體也打成一片了，這也就是奉事上天的唯一方法。

不但如此，內心與形體打成了一片之後，我們便會有浩然之氣。原來，人是一個小宇宙，這個小宇宙是與大宇宙息息相關的。

人性固然是天所賦予的，而宇宙也是天所創造的。兩者既是從同一個源頭發出來的，所以它們之間，非但沒有阻隔，而且是一氣貫通的。因此，孟子形容浩然之氣說：「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。」浩然之氣，是發源於天人合一的境界（我們如能充量地發展我們所稟的天性，那就是天人合一）。而浩然之氣的效果，則使我們與大宇宙也合而為一。這樣，我們才會有物與民胞的胸襟，「以天下為一家，以中國為一人」，自然而然的達到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的目標。這才是人生之至樂。

明儒王陽明先生是最得力於孟子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他的良知良能是淵源於孟子性善之說的。可是陽明先生對於「樂」的觀念，似乎比孟子還要進一步。照他的看法，「樂是心之本體。雖不同於七情之樂，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；雖聖賢別有真樂，而亦常人之所同有。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，反求許多憂苦，自加迷棄；雖在憂苦迷棄之中，而此樂又未嘗不存；但一念開明，反身而誠，則即此而在矣。」（《傳習錄》卷中）後來有一個學生向他說：「樂是心之本體，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，此樂還在否？」他的回答是最有意思的了。他說：「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；不哭，便不樂矣。雖哭，此心安處，都是樂也；本體未嘗有動。」（同上）這樣看來，陽明先生的「心學」，簡直可以稱為「樂學」。他的學生王心齋先生曾作一首〈樂學歌〉，多少可以代表孟子與陽明先生的心得：

人心本自樂，自將私欲縛。私欲一萌時，良知還自覺。

一覺便消除，人心依舊樂。樂是樂此學，學是學此樂。
不樂不是學，不學不是樂。樂便然後學，學便然後樂。
樂是學，學是樂。嗚呼！天下之樂，何如此學。
天下之學，何如此樂。（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二）

三、程明道先生

以筆者的看法，在宋明諸儒之中，最能體會孔子與顏子的樂處，要算程明道先生了。他曾有詩句說：「時人不識余心樂，將謂偷閑學少年。」試問他的樂處究竟在那裏呢？這個問題可以用他的一首七律來答覆：

閒來無時不從容，睡覺東窗日已紅。
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
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風雲變態中。
富貴不淫貧賤樂，男兒到此是英雄。（〈偶成〉）

觀此可見明道先生的胸襟了。在他的人生觀中，靜與動，形上與形下，一與多，是渾成一體。這首詩字裏行間自然的洋溢著一股祥和之氣。這樣的氣象，實在是中華文化的特徵。

明道先生曾說：「形而上者存於洒掃應對之間，理無大小故也。」（見《濂洛關閩書》卷三）這豈不是將形而下與形而上熔為一爐嗎？他之所以能見得這麼真切，是因為他有極高超，極遠大的眼界。比如他說：「太山為高矣，然太山頂上，已不屬太山。雖

堯舜事業，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。」（《宋元學案》卷十三）他又說：「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。」（同上）如能對越在天，則洒掃應對，莫非是道。若不能對越在天，即堯舜事業，也是暫時的。明道先生的理想是：行於六合之內，而道通六合之外。這也就是孔子「下學而上達」的心傳。他說：「坐井觀天，非天小，只被自家入井中，被井筒拘束了。然井何罪，亦何可廢，但出井中，便見天大。已見天如此大，不為井拘，卻入井中也不害。」一個人如果從未出井，一觀宇宙之無窮，與人類文化之無奇不有，結果必致故步自封，自以為是，把相對的道理當作絕對；這樣的人只可稱為鄉愿。相反的，如果既出了井，便不肯復入井中，以盡每個人日常所應盡的本分，結果必致放浪不羈，與人群格格不相入，為求個人的自由，反作自由之奴隸。最理想的是向大處遠處著眼，而從小處近處做起。這樣才能無處不盡責，而同時也無處不超脫。這樣才能把形而上與形而下打成一片，也就是能致良知。「道通天地有形外」，固然是致良知；「思入風雲變態中」，也何嘗不是致良知呢？能致良知，便是人生之至樂。總統蔣公曾說：「致良知如何可樂呢？因為致良知的第一義，即是求其心之所安，心既安了，不愧不作，無憂無懼，如何不樂？」（見秦孝儀先生編《蔣總統嘉言錄》第一輯一九〇頁）

大家都知道，明道先生是一位大儒。但是在他的時代，儒家的大道理已被科舉制度束縛得太狹仄了，太形式化了。一般小儒只在文字上做工夫，人云亦云，連一點點的創造力都沒有了。於是明道先生「汎濫於諸家，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」，最後才始「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。」（《近思錄》卷十四）雖然真正的道理在六經

之中，可是老釋的思想，卻開了他的眼目，而且給他不少新鮮的啟發與觀點；這是不可否認，也不用否認的事實。我們至少可以說：莊子與禪宗的思想，對於明道先生和其他的新儒（朱子在內），是一個極大的興奮劑。本來對學問來說，孔子原是主張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的。門戶之見是最要不得的。正惟儒家能吸收他家的優點，適足證明儒家的偉大。比方，明道先生對於莊子就有十分公允的評論說：「莊子無禮無本，然形容道理之言，則亦有善者。」（《濂洛關閩書》卷九）朱子對於禪學也有深刻的評論說：「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，如云：『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物主，不逐四時凋；又曰：『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，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；又曰：『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』看他是什麼樣見識！今區區小儒，怎生出得他手，宜其為他揮下也。此是法眼禪正師下一派宗旨如此。」（《朱子語類》第一百十六卷）明道先生當然也曾研究禪學，就像高景逸先生說：「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，識得禪弊真。」（《宋元學案》卷十四）

我們在這個大時代，如要復興中華文化，對於西學的優點當然也要儘量吸收，以充實我們自己的文化。我們對西學的態度，也要像宋明的大儒對於老釋的態度一樣，一方面要有「慕西學之心，窮天地之想」（《國父手書·自傳》），而一方面對於固有文化與道德，也要有擇善固執的毅力（見《國父的民族主義》第六講）。正如宋儒從道家與禪學之中，吸收了不少的真知灼見，結果光大了儒家的門楣，復興了儒家的人生哲學，同樣，我們在今日之世，也要從西學中吸收新的方法和新的見識，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，為全人類創造一個偉大的綜合，這就是我們快樂之所在。

莊子的智慧

一個新估價^①

一、他的一生^②

我們對於莊子的一生知道的很少。雖然經過許多學者的探討，我們還不知道他究竟出生在那一年。我們只能說，他是孟子（公元前三七〇——二八九年）同一時代的人，但比孟子年輕。

他們兩人始終沒有見過面，談過話，事實上他們的著作也並沒有互相提及。這也並不是怪，我們應當記住《孟子》和《莊子》這兩部書在作者生前並不存在，而是他們的徒弟所編撰成的；他們兩人彼此雖然都知道對方的尊姓大名，但是都不敢憑道聽塗說而彼此批評。根據可靠資料，莊周是宋國的蒙人（今日的河南省），

① 本文曾參考嚴靈峰先生的《老莊研究》（一九五九年香港出版）以及 Simon Ting 的 *The Mysticism of Chuang Tzu: Its Mor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* 手稿。

② 這一部份大多以《莊子》一書，以及司馬遷的《史記》為根據。司馬遷對道家的認識很膚淺，他的父親司馬談則有比較深入的認識。